

论邓演达三民主义思想

彭敦文

本文探讨了邓演达三民主义思想及其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上的特点,认为邓演达三民主义思想可分为两个时期:大革命时期,以形成其基本框架为特征;大革命失败以后,以将孙中山三民主义具体化为特征。前一时期,邓演达三民主义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阐发三民主义整体观,以“耕者有其田”为中心的民生主义和注重农民民权的民权主义思想上;后一时期,主要体现在以民族革命为内容的民族主义,以平民政权建立为中心的民权主义和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发展方向的民生主义思想上。两个时期的思想内容基本相通,而民生主义思想在后期与孙中山更加接近。上述内容决定了他在继承三民主义方面与戴季陶、胡汉民完全不同。

孙中山三民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体系。在孙中山逝世后,不少人都以“三民主义的继承者”自居,并在三民主义理论旗帜下阐述自己的政治经济思想,自成体系。邓演达是中国革命历程中具有独特政治性格的革命家,其三民主义思想颇受重视。那么,综合他一生来看,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有何内容?他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方面有什么特点呢?本文拟就此进行讨论。

邓演达早年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信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形成后,也积极宣传三民主义。但分析他思想上的内心取向,可以发现他对三民主义并不满足于一般的理解,而想作更深入的研究。他在1924年底《致张难先信》中典型地表达了这一想法,表示要以“至坚至诚之心志”、“随求真求美之热诚欲望效其死力”,“向学术场中拼命”,继续追求真理,从而摆脱“拘虚、迷信、空想、隘陋”的束缚^①。带着这种愿望,邓演达赴欧学习政治经济学近一年。尽管这期间他在思想上收获很大,但由于与国内隔膜,对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关于三民主义解释的混乱状况知之甚少,因而在与胡汉民谈话和回国初期与戴季陶的会见中,表现出对戴季陶主义曲解三民主义的主观动机和右派本质缺乏清醒认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左、右派在政治、思想、组织各方面的斗争日益尖锐,在如何继承三民主义的问题上,邓演达表现得越来越清醒。他坚持捍卫和发展三民主义,终生不辍。综观邓演达三民主义思想,依其阐述的重点不同,可分为大革命失败之前和之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主要是形成其整体框架;后期主要是将其具体化。我们先来看看他前期的三民主义思想。

我们知道,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胡汉民、西山会议派等一系列右派人物都争相阐发各自的三民主义思想。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反对进行彻底的、尤其是动员千百万农工群众参加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面对这种混乱的理论状况,邓演达首先提出了统一三民主义理论。统一原则是,“把总理的主义还原”,“把后添的、蒙混的、神秘的色彩去掉,拿科学的批评方法清洗,去还他的真面目”;“统一在真实的、为多数痛苦民众而奋斗的三民主义下面”,反对三民主义的“封建化”和“孔子化”^②。为此,邓演达结合革命形势的需要,作了大量的理论阐述。简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阐发了三民主义的整体观。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承认三民主义具有整体性,但如何认识这一整体则差异颇大。如戴季陶,虽然也讲“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但又说,“把东方文化的精神,极端的高调起来,是中山先生中心思想的表现”^③,并由此而演绎出从孔子到孙中山的道统嬗递。邓演达反对这种理解,认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是要消除各种“剥削及压迫,适应民众的要求”^④。具体地讲,“一、民族主义是革帝国主义统治的命而求中国的自由独立;二、民权主义是革封建政治的命而造成民主的政治;三、民生主义是革封建经济的命而得着非资本主义建设道路。”^⑤而它的内容和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认为,“进行农民的政治争斗,是民主政治与封建政治的争斗,所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进行农民的经济争斗,是推翻封建地主的剥削,推翻封建经济的基础,所以是民生主义的革命”;不仅如此,“中国农民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农民不能觉悟的坚决的参加反帝国主义争斗,则民族主义革命必不能完成。”^⑥因此,三民主义要以解决农民问题为基础。“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到农民问题”^⑦。相反,“破坏农民运动,是一民主义,是半民主义”,是对三民主义的“断章取义”^⑧。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演达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是将其作为三民主义三大内容联系的唯一环节,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分析,予农民问题以三民主义重要理论地位。由此推展开来,邓演达还论述了农工是实现三民主义的主力军问题,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欧洲民生主义式的单纯对封建制度的革命”,“国民革命之重担不得不落在大多数的痛苦的农人工人的肩上”^⑨;由于民生主义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生产农民和无地的农民”,“生产工人和行会的手工业工人”,都是“民生主义革命的主力军”^⑩。从上述内容,可以得出邓演达三民主义的整体观是,三民主义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为内容和目标,以农民问题为各大内容的唯一联系环节,以农工为实现三民主义的主力军,实现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

第二,以“耕者有其田”为中心阐述民生主义的内容。“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大革命后期,在这一问题上争论日益尖锐。邓演达以自己独特的三民主义整体观为前提,对此更是重视。他认为,“土地问题解决了,才算是农民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若果不能解决,我们可以说是革命必不可能成功”^⑪。因此,他说:“土地问题可算是我们的中心问题的中心问题”^⑫。如何解决土地呢?邓演达主张继承孙中山民生主义内容中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的原则。在具体实行上,“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

“第二步经济的解决”。所谓政治解决，“是把政治上的仇敌扑灭”，把他们由政治权力而带来的“经济上的特殊利益打毁”；所谓经济解决，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⑩。对于这两步如何区别和连接，邓演达认为，像湘鄂两省的情况，农民“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政权，在经济上已经到了要求土地的时候”，应该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分配与农民”^⑪。在这一问题上，不应当等“军事胜利了”和“统一了全国”以后进行。“农民并不能够等到统一之后，才来解决土地问题”^⑫。因此，邓演达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上，是主张随着革命的发展而逐步地、有先有后分地区进行。实行这一政策之后，除了能够推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保障革命成功以外，他还指出，“可以增加农民的生产产品和购买力，提高他们的生活”^⑬，“人民的负担既可减轻，财政的收入又较前增加”，在政治上还可以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⑭。更重要的是，从经济上解决农民问题，就能“推翻租佃制，推翻地主与其他封建统治者的剥削，使土地农有”，同时也能“发展农村生产，促进工业”^⑮。可以看出，邓演达在考虑“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思想时，不仅仅是从革命需要出发，还从财政和工业发展上予以重视，这是值得注意的。总的看来，这一时期，邓演达是以“耕者有其田”为内容来阐述民生主义的。

第三，注重农民民权的民权主义思想。在邓演达看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要推毁封建政治而实现民主政治。由于中国人口中农民占80%以上，所以，农民不仅是经济问题的中心，而且还是政治问题的中心。他指出，“农民问题是政治的中心，一切生产都是由农民造出来的，政治的巩固也靠着农民”。在封建社会中，农民直接在受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尽管他们举行暴动，“把旧政治打破，以成立比较有民主主义的色彩的政府”，但“旧的锁链刚一挣断，新的锁链又来锁着了”，结果农民仍受着封建政治统治。农民要突破这种循环，得到民权，必然要“和世界打成一片向进步路上走；将来要由农民和工人来造成民主政治”^⑯。因此，农民同其他革命阶级一样，是构成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总理的民权主义，就是要使乡村的农民起来，使他们自己管理乡村政治，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这样农民既然握到乡村的政权，由各乡而至改组各区，由改组各区而至改组各县，由各县而至改组省政府，这政府才是人民的”^⑰，“才能一步一步地造成民主政治”，“所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要农民参加才能成为民主政治”^⑱。可见，使农民参加政权，行使民主权利，是实现民主政治，实现民权主义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同时，邓演达还认为，“欲使土地问题得解决”，必须“使政权掌握在农民手里”，“乡村有了组织完备的自治机关，农民有了政权”，农民问题就“很容易解决”^⑲。这里，邓演达看到了农民民权的实现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等的关系，把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在具体的农民问题上联系起来。这是邓演达这一时期三民主义思想中颇具特色的观点。除上述论述以外，邓演达还阐发了以各人民团体参政实现民权主义的思想。他指出，“人民组织起来，工人有工人的团体，农民有农民的团体，各界有各界的团体，组织而成为乡民会议、县民会议，而直至省民会议，这才是总理的民权主义之真正的表现。不然，天天只换了大总统也都是假的。”^⑳显然，他将各人民团体有组织的参政、形成政权的主体视为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精髓。与此相联系，邓演达还从分析经济关系入手，论述了依靠中国资产阶级实现民主政治是行不通的，认为在欧洲，“因为工业的生产，超过农民的生产，一切交通工具非常完备”，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由工商业者的经营而统一”，“支持他们的国家政策”，实现了民主政治。但在中国，“新兴产业组织者就容易与帝国主义者的保护人军阀或开明军阀勾结妥协”，并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因此，“纯粹靠新兴产业的组织者去统一中国，造成民主的

中国,是不可能的。”因而,“想根本用欧洲近代民主议会政治的方式去行使政权”,也行不通^④。这一见解十分精辟。从上述内容看,邓演达注重农民民权,注重基层民主政治,注重从现实经济关系中找到实现民权主义的途径,丰富了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内容。

除邓演达上述三民主义思想外,民族主义思想内容也十分丰富。这一内容很多研究者已有很多的论述,此处从略。不过,应该提及的是他不仅继承了孙中山民族对外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还继承了对内实行自由、平等、共和的处理国内各民族间关系的原则。将上述内容归纳起来看,邓演达以自己的理论阐述,继承和丰富了孙中山三民主义。

二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出亡国外,至1930年5月秘密回国,致力于复兴平民革命,继承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以“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相号召。这一时期,邓演达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很少使用“三民主义”这一词语,而是以自己的话直述政治主张,甚至连“民主”、“民权”等词都较少使用。这似乎与“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相矛盾。对于这一原因,邓演达自己的说明是:“我们的斗争目的就是实现三民主义”,但是,国民党不仅使“革命中断,而且把三民主义弄得扑朔迷离,为民众所厌闻”,致使革命者“想抛弃了三民主义去别求途径”,因而要“恢复中断的中国革命,只有使三民主义更加具体化”,“才是忠实的中山主义信徒”^⑤。据此可知,邓演达在自己的思想表述中尽管很少直接使用三民主义的相关固定词汇,但不等于已经脱离了三民主义理论,而是鉴于三民主义理论的混乱状态和社会反响而有意规避其固定词汇。这种有意规避,在邓演达看来,是三民主义忠实信徒的不得已而为之,它说明邓演达思想仍旧是有意识地沿着三民主义理论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邓演达政治思想的内容仍旧以三民主义为基本框架,且与前一时期的三民主义思想有基本相通之处。他思想发展的这一时期可称之为“三民主义具体化”时期。其内容可简单归纳如下:

第一,以民族革命为内容的民族主义。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⑥，“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完全解决的任务，所以必然是民族的”^⑦。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是民族的，从邓演达的整个论述来看，含有三层释义：其一，在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上是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势力驱逐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平等。这一内容与孙中山相应部分论述基本相同，毋庸赘述。其二，完成民族解放的力量必须是平民。邓演达指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因“依存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及经济的势力以保障资本的安全”，“不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广大的民众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无畏的作反抗帝国主义之斗争。”^⑧其中又“要以农工为核心”。从整体上看，“不但对外要履行国民革命的任务，而且对内要履行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⑨，实现民族和平民的双重解放。因此，邓演达称之为“民族的平民革命”。这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特性。其三，中国民主革命必须是民族自行解放。邓演达指出，民族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物质的解放，而实更主要的在于精神的解放”^⑩。所谓“精神的解放”，邓演达的解释是，“中国革命由中国人民自己去复兴，那不但是可以恢复中国人民自信的活力，恢复中国民族自信的活力，而且更进一步可促成世界的转变。”^⑪这里，邓演达强调的是民族的自主、自立和自信，通过民族革命，予以发扬光大。这是邓演达民族自行解放的文化涵义。从

现实上看，邓演达认为，“只有民族自己可以解决及完成民族的要求，更只有平民大众自己可以民族革命行程中完成平民大众的解放要求”^②，这是人民自决和独立原则的要求^③。可见，邓演达民族自行解放的思想十分丰富。民族的自行解放并不等于孤立自己。邓演达指出，苏联、各被压迫民族等革命力量都是中国反帝革命中应该联合的对象。

第二，以平民政权建立为核心的民权主义思想。这一时期邓演达民权主义思想是大革命时期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其内容充分体现在他的“平民政权”思想中。“平民政权”思想源于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是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邓演达曾指出，“国民会议在目前是复兴中国革命的最急迫的工作。国民会议的构成应以十三年冬孙中山弥留时所发表开国民会议的方案与目前民众现实要求为基础”^④。国民会议是平民政权的组织形式。可见，邓演达是根据孙中山的这一主张结合具体情况而提出平民政权思想的。根据邓演达的阐述，“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民大会，由“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组成。实行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合一^⑤。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权。因为：首先，“只有人民自己可以了解自己的痛苦与要求，只有了解自己的痛苦与要求的人们才可以代表痛苦无告的平民群众。”^⑥因而，平民政治中要工农占多数。其次，“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工平民及其他的现时的经济阶段还有相当生产作用的职业及准职业团体，如果不能在将来的国民会议发生主要作用”，将产生政权与“生产行程隔绝”，滋生官僚政治，民权不能真正实现。所以，平民政权需以各生产部门的职业团体代表为基干组成^⑦。再次，国民会议要是“真正的人民全体意志的表现机关”，就“要在执行机关之上，而不是执行机关的附庸；它要行使立法及监察的职权”^⑧。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将立法、执行、监察三权合一，以惩三权分立或三权倚重之弊。因此，国民会议必须是最髙权力机关。在国民会议代表选举资格上，邓演达主张“只要是属于各该人民团体，不受性别、资格、学历、财产，从业年限等等的限制”^⑨。邓演达上述民权思想表明他是一个彻底的民权主义者，尤其是他的议行合一、强调生产者民权的思想更为可贵。这是他发展孙中山晚年民权主义思想最多的地方。

第三，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发展方向的民生主义思想。邓演达这一时期的民生主义思想极为丰富，其总体构架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在“耕者有其田”、“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等方面，与孙中山民生主义大同小异。如在“耕者有其田”问题上，邓演达主张，“不耕作的人不能有耕地”。“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及最低额”，最高额以外的土地，“应由国家以全国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按确定的价格，“收买归为国有”；最低额以下的土地，“应强迫使其互相合并或加入合作社经营之”；“国家以外的公共团体所有土地亦按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法，由国家收买为国有”；“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的及其他反革命的团体的全部没收为国有”；“一切国有的土地”，“按照土地分配原则及各地地方标准”分配给耕作的农民；“不准私行买卖土地，必不得已时的土地占有权及使用权的转移按土地法得管理机关的允许而后行之”；“领有土地而不耕作，或怠工、耕作不力的农民应被剥夺其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耕作私有土地的农民犯以上条件则并剥夺其占有权”^⑩。可以看出，邓演达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主张的是国有制、私有制并行的土地制度。其中，私有土地制受国家的严格限制；土地国有制是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取消由土地私有而带来的剥削。整个方案，除没收土豪劣绅等反革命土地外，基本精神是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

张。关于这一点,邓演达认为“经济制度的转移,绝不是用单纯否定消灭的方式可以做到,而要用有组织的争斗程序,才能向前发展,否则只有灭亡与消毁,得不到什么”^④。因此,他反对以革命手段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共产党差距甚大。与此相联系,邓演达还主张以科技提高农业生产力,利用国内外资本筹措农业生产经费,提倡农业合作经营,发展社会化大农业,实行移民垦殖等。这些都说明他具有比较清晰的农业现代化意识。

在“发达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方面,邓演达继承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大产业、关键产业及独点性产业”国营公营,但“小规模私人企业必须允许其存在,使能辅助国有公有产业进行生产”^⑤。“私人的工商业尚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令其有限制的存在”^⑥。这些基本上反映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相关内容的精神。在具体政策上,邓演达特别注重金融机关国有。他认为,“金融资本不但对外有控制外交政策的力量,而且对内为集中资本,支配国家财政及国民收入,统一的施行经济建设的中枢”^⑦。在实现国家控制金融的方法上,主张“把一切可用为国家金融机关的设备如银行及大钱庄等,分别由国有有偿的收用;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华的金融机关,必然分别收回,以构成国有金融机关的基础”^⑧。这样,就可以形成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点与孙中山经济思想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只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方法上的差异。它不构成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演达反复强调,他的经济主张是要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此必须“消灭封建的残余”,“清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即对内需变革税制、整理货币、消除产业发展障碍;对外实行关税绝对自主、收回各外资经营和外人管理的企业、发展国际平等经贸关系等^⑨。对于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邓演达认为,它能“运用由国家集中的资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能“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势力底膨胀,并使其逐渐的社会化”,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⑩。在这里,国家资本主义成为经济上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和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邓演达的这一思想容易引起人们误会,以为它突破了民生主义思想。其实不然,在邓演达眼里,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界线十分模糊。如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自始即没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他晚年的主张,很明白的指示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去奋斗”。我们知道,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因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内容本身就包含着“实现社会主义”的内容。从邓演达上述理解来看,也正是这样,即把“实现社会主义”当作民生主义本身的内容。此外,邓演达一直认为民生主义革命就是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并明白宣示,“我们的斗争目的就是实现三民主义”,即“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明确地显示,邓演达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作很清晰的区分,并且将“实现社会主义”当作三民主义的内容。因而,邓演达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生主义仍没有超越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范围。这并不是说邓演达的民生主义思想毫无意义,而恰恰证明他“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彻底地了解”,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继承者。

从上述内容来看,邓演达三民主义思想在继承和发展孙中山三民主义方面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整体上看,邓演达不是全盘照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符合革命需要的有关内容。如在民族主义中,注重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

内容；在民生主义中，注重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内容，并将其发展为“平民政权”思想；在民生主义中注重其土地问题、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归宿的内容。对于与三民主义相关的哲学思想却是很少论及。这和戴季陶注重从哲学、文化上论述三民主义与胡汉民注重从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上进行阐述的特点极不相同。从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的继承情况看，邓演达、戴季陶、胡汉民是三民主义继承问题上的三种类型的代表，其中邓演达是最注重从民主革命实践上继承三民主义的代表者之一。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的三民主义思想值得重视。第二，从具体内容上看，邓演达三民主义思想中最具独特意义的内容有两点：其一是将农民问题视为三民主义的中心环节；其二是以农工民权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思想。这两点都是邓演达将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与三民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并从三民主义角度进行阐述的。从中可以发现，邓演达并不完全固守孙中山的某些教义。如“五权宪法”、“权能分开”的思想在邓演达三民主义思想中就毫无踪影。这一点也是研究邓演达对三民主义继承问题值得重视的。第三，邓演达三民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在1929年以后更为丰富。这些内容尽管因其具体背景不是在三民主义词句下进行阐述，但无论从邓演达主观意识，还是从其思想内容上看，都是直接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并且在民生主义思想内容上，与孙中山民生主义更加接近，在民权主义思想上则着重发展了孙中山晚年的国民会议主张，且将其视为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也是应值得重视的。

注 释：

- ① 《邓演达文集》，第1—3页。
- ② 《邓演达文集》，第28—29页。
- ③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 ④ 《邓演达文集》，第31页。
- ⑤ 《邓演达文集》，第123页。
- ⑥ 《邓演达文集》，第123、125页。
- ⑦ 《邓演达文集》，第90页。
- ⑧ 《邓演达文集》，第115—116页。
- ⑨ 《邓演达文集》，第16页。
- ⑩ 《邓演达文集》，第124页。
- ⑪ 《邓演达文集》，第89页。
- ⑫ 《邓演达文集》，第69页。
- ⑬ 《邓演达文集》，第97—98页。
- ⑭ 《邓演达文集》，第97、98页。
- ⑮ 《邓演达文集》，第90页。
- ⑯ 《邓演达文集》，第95、97页。
- ⑰ 《邓演达文集》，第97页。
- ⑱ 《邓演达文集》，第125页。
- ⑲ 《邓演达文集》，第73、74页。
- ⑳ 《邓演达文集》，第48页。
- ㉑ 《邓演达文集》，第75页。
- ㉒ 《邓演达文集》，第99、110页。
- ㉓ 《邓演达文集》，第49页。
- ㉔ 《邓演达文集》，第110页。
- ㉕ 《邓演达文集》，第347—348页。
- ㉖ 《邓演达文集》，第347页。
- ㉗ 《邓演达文集》，第299页。
- ㉘ 《邓演达文集》，第345、348页。
- ㉙ 《邓演达文集》，第299页。
- ㉚ 《邓演达文集》，第240页。
- ㉛ 《邓演达文集》，第318页。
- ㉜ 《邓演达文集》，第275页。
- ㉝ 《邓演达文集》，第165页。
- ㉞ 《邓演达文集》，第375页。
- ㉟ 《邓演达文集》，第351、352页。
- ㊱ 《邓演达文集》，第151页。
- ㊲ 《邓演达文集》，第152页。
- ㊳ 《邓演达文集》，第153页。
- ㊴ 《邓演达文集》，第154页。
- ㊵ 《邓演达文集》，第307页。
- ㊶ 《邓演达文集》，第308页。
- ㊷ 《邓演达文集》，第304页。
- ㊸ 《邓演达文集》，第300页。
- ㊹ 《邓演达文集》，第360页。
- ㊺ 《邓演达文集》，第361页。
- ㊻ 《邓演达文集》，第358、359、360页。
- ㊼ 《邓演达文集》，第357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